

西汉经学与政治

西汉经学与政治

杨向奎 著

西汉经学与政治

杨向奎 著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西汉经学与政治

著者 杨向奎

发行者 独立出版社

印刷者 独立出版社

公元二〇〇〇年五月

重印三百册珍藏

本册编号 第一四六号

自序

研究经学史的人，多注意于今古文之不同，而罕道孟、荀之差异，此乃如「数典忘祖」。西汉经师，一面承袭思、孟之天道说，一面又承袭荀子学派之思想。后孔子儒，应分为孟、荀两大派的。

今古文经，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异，即有差异，也如同为今文而有不同。公羊学派，是今文经学，而受有荀子的影响；但我认为周礼也出于荀子学派，那正是后王之粲然者，当为时王所取法。就周礼所表现的思想而论，其中重刑赏的观念，也是取自法家。同出于荀子后学的书，而有今古之别，那么，所谓今古文者也不过立学官分先后而已。

这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我这本小书虽努力作如是的解释，但忽略和草率的地方很多。一来因为教书没有充分时间，二来书籍不够用。补充和校正只好俟诸异日了。

类似这种性质的文章，过去有钱宾四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和顾颉刚先生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两大文，我得力于此两文者当然甚多。写此文时，黄仲良先生及林冠一再晋叔两兄时加鼓励，而同学王瑞明、赵文涛、马羲德诸君任钞写之劳，今统此致谢。

三十二年三月廿五日于城固西北大学

目 录

(一) 五行说的起源·····	(一)
(二) 汉初属德·····	(二五)
(三) 汉武帝的政治思想及其设施·····	(三八)
(四) 儒教与董仲舒·····	(五八)
(五) 汉历将终之说·····	(七二)
(六) 王莽篡位及其相关问题·····	(八六)
(七) 结论·····	(一二二)

目 录

西汉经学与政治

(一) 五行说的起源

西汉政治受当时经学的影响，而当时经学以五行学说为骨干，所以十余年来治西汉之经学与政治者，莫不以五行说为研讨的中心。顾颉刚先生编著的《古史辨》第五册就是以此为中心的代表著作。但五行说的本身问题实多，如果弄不清五行说的起源，则相生相胜两说的先后问题，将无法解决；解决不了此两说的先后，则所谓「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也者，将无从谈起。第五册《古史辨》所收的文章虽多，但于五行说的起源，等于白卷，思孟五行说更成僵局。顾颉刚先生的《思孟五行考》就是说荀子太糊涂，不应当把邹衍当孟子；钱宾四先生的文章于此也没加深考；其余诸家更少令人满意的解释。那末，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有待于我们的努力么？最先提出五行说的创造者是荀卿，他说：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声，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荀子卷三非十

二子)

代表子思的书是中庸，孟轲是孟子；有的人们于今传中庸孟子白文中不见有金木水火土等相联的字句，遂以为子思孟轲未尝唱和。我们当然可以在汉书艺文志内寻得子思孟轲的已佚著作，安知五行说不在佚书内么？这是遁词，不够作证明。但如果我们能注意到荀子所说「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几句话的含意，足以给我们一种暗示：「思孟五行说不是太清浅的，一看就能了然的」。最先考证子思五行说的是章太炎先生，他说：

荀子非十二子讥子思孟轲曰：「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杨倞曰：「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也」。五常之义旧矣，虽子思始创之亦无损，荀卿何讥焉？寻子思作中庸，其发端曰「天命之谓性」。注曰「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智，土神则信」。孝经说略同此（王制正义引）。是子思之遗说也。（太炎文录初编卷一子思孟轲五行说）。

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承认。一来是中庸的注解出自东汉郑玄，那是五行说的大盛时代，郑玄的解释未必能代表子思。二来是太「幽隐而无说」了，很难使人了解。我认为他们的说法并不荒唐，儒家的性与天道说是含有五行思想在内的，但须得加以进一步的解释。这种工作非片言可决，因为是最难懂的学说，不妨从浅处看起，先说孟轲。孟子中的五行思想，依注家解释也显然具在，如：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

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孟子卷四公孙丑下）

这里所说的天时，依赵岐注，固已解作「时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虚之属」。孙奭正义自然依此立说，后来朱子集注也本此无疑，他并且说：「孤虚以方位言，如俗言向某方利，某方不利之类，王相，指日時」。（朱子语类卷四十五）不过赵岐也是东汉人，他的解释能代表几成孟子，不是同样成问题么？但我们以孟子同时或稍后的书籍来解释，则兵家之所谓天时，非时日五行之类莫属。反对孟子的荀子就有这样的话：

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荀子卷二儒效）

在兵家的禁忌，是岁星所在，国不可伐。（见汉书天文志）这不是很近于孟子赵注的说法么？比这更明显的例证，则有韩非的说法：

初时者，魏数年东乡攻，尽陶卫，数年西乡以失其国。此非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非数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非数年在东也。（韩非子卷五饰邪）

这种因星辰方向的不同而致用兵胜败的结果，也正可以解释孟子的话。吕氏春秋十二纪内多有此种思想，如孟春纪云「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又仲秋纪云，「凡举事无逆天数，必顺其时。」举事，月令作「举大事」，当指兵事而言。十二纪是五行学说系统最完备的书，那里面的五行说，不仅是人类的思维律了，是人类行为的法则，每一纪有每一纪应当的行为，违犯了是要遭致天殃的。淮南子的记载，更是

给我们讲解孟子天时的良好证据。

将者必有三隧四义五时十守。所谓三隧者，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中察人情（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训）这是说明一个将官应当具备的知识。所谓天道，即孟子所说的天时。同书有对于天道的解释道：

明于奇正实，阴阳刑德五行望气候星电策讥祥，此善为天道者也。

天时，天道，或谓之天数，兵略训又说：

所谓天数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

这正同于十二纪和月令的分配法，是正统的五行说。今传孙子一书，虽属伪托，但亦不能晚于战国，那里也说兵之五事，「一曰道，二曰天」，而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孙子卷上始计）这些同于或稍晚于孟子的材料，还不够解释孟子的「天时」？固然，或者说学派不同，解说亦异，但你要知道，如果一个学者说他自己学派内的专题，也许有不同凡俗的解释，如老庄谈道，孔孟言礼，但兵事上的天时，似乎是当时人的常识，儒家、法家、兵家、杂家全都谈它，兵法诸家的解释即同，何以儒家乖异，况且由以上的解释，虽然不能说五行说创自军事学家，但军事上惯于利用五行则无疑问。除此以外，在吕览、淮南是撮儒墨道法诸家之要的，有什么方法证明它的记载不能代表儒家？

春秋或者西汉，军队的行列组织亦可作证，如国语吴语云：

吴王昏乃戒令秣马食士……载常建鼓，挟经秉枹。为万人以为方陈，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矟，望

之如荼。王亲秉钺，载白旗以中陈而立。左军亦如之，皆赤常赤旂丹甲，朱羽矟，望之如火。右军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乌羽之矟，望之如墨。

这虽然没有依方位来分配五行，但依韦昭的注解，左为汤，所以尚赤，右为阴，斯以尚黑，也还不离阴阳五行的说法。后来，西汉初匈奴冒顿用兵，很明显地依五行来分配行列，如云：

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骠马，北方尽乌骠马，南方尽驎马。（史记匈奴列传）

这时候，五行说已经大盛，所以匈奴也受此影响而利用之了。那么孟子的「天时」，既和军事有关，而古代的军事上惯于利用五行，越发可以证明孟子的天时包含有五行说在内了。

以上只是证明了孟子中有五行思想，并没有谈到它的体系，所以觉着平凡，不是「幽隐而无说」了。章太炎先生子思五行考的失败，就因他陈义太高，未能从平凡处下手。其实中庸中尽有「平凡」的五行说，其中引用孔子的话道：

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

「素隐行怪」是历来注家讲不通的话，而汉书艺文志引作「素隐行怪」，师古注以为素隐是「求素隐暗之事」。朱子注中庸本于此说而谓「邹衍推五德，后汉讲谶纬，便是隐僻」。（朱子语类卷六十三大意）这虽然说是孔子的话，引在中庸，正好代表子思。不是又有这样的记载么？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

任何注家虽然没有把「上律天时」解说有五行思想，但只有五行说的「天时」为可律。吕览月令的「五行律」，正由此出发。我们不要以为孔子的思想没有五行成分，如果现存论语可以充分代表孔子，尧曰编的记载正可作证：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久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这同时也见于伪古文尚书的大禹谟。伪孔传以为历数即天道，是说历运之数应当归于舜了。什么是历运之数？这种历运以五为纪，可以叫做「五运」，而通称之曰「五行」。我认为最初五行说的主要意义，是以五为纪的循环。金木等五材的提出，那只是五行的表德，不是主要部分，更不是五行说的全体。后来的五行说专言金木水火土，多少和思孟的学说并不符合。孔子虽不语「怪力乱神」，但也颇道祲祥灾异，他曾说：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

如果不是见于论语，正可以疑惑是汉人的话了。

胡适之先生曾说孔子时代有一种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胡适论学近著说儒）。我们认为那不是预言，而是他们的定理，「五百年」是以五为纪的大循环。孟子的五行说就多言「五百」，如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公孙丑），又云「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尽心）如果不以五行的学说来解释，他为什么老说「五百」？托名于贾谊的新书，就有

「圣王之起，大以五百为记」的话（卷一数字）「五百为记」当然接近于五行的解释。其后杨子的法言，更有专篇来讨论这「五百」的问题：

圣人聪明渊懿，继天测灵，冠乎群伦，经诸范，撰五百。或问：五百岁而圣人出，有诸？曰：尧、舜、禹，君臣也，而并；文、武、周公，父子也，而处。汤、孔子数百岁而生。因往以推来，虽千一不可知也。圣人何以拟天地而参诸身乎？（法言五百篇）

扬雄虽然没有肯定「五百岁而圣人出」的价值，但他说圣人聪明渊懿而撰「五百」，可见古代必有以五百为题的专书，其中一定是以五行说为中心的，可惜现在看不到了！原始五行说的创兴，虽有许多原因，而古人对于「五」的数字之迷信，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最能代表这种观念的是易系辞：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易系辞上）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此？（同上）

这全是以五作中心的变化，徐文珊先生说：

「天数奇，地数偶」，是由卦爻一一来的。「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全是

五的倍数)，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五岁再闰，「参五以变」，何以全是「五」呢，竟自这等巧，岂不奇怪。（古史辨第五册下编儒家和五行的关系）

这自然不足奇怪，是古人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我以为邹衍的「主运」说，正是承袭儒家以五为纪的五行说。「行」和「运」和「历」的意义相同，所以五行说可以呼之曰「主运」，又可以别称之曰「历数」。「天之历数在尔躬」，正可以解释成「按照五行的次序，应该你作皇帝了。」

郭鼎堂先生的「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是一部伟大的书，他也是肯定儒家五行说的一个。他说「子思孟轲的五行说在今存的思孟的书虽然不见，但在尚书的洪范中是保存着的。洪范那篇一定是子思做的文章，就文章和思想的内容上看来，尧典，皋陶谟，禹贡的那三篇也当得是他做的。子思应该说是战国的一批分析学派的创首，他的五行说到了惠施手中变为「小一」，到了邹衍手中便扩大了起来，成为了阴阳生胜之学，更演为灾变神异的秘教，儒者也就纬言起来，荀子要尽力的排斥那倡始者是有由来的」。（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四）郭先生论史多有创见，这种说法，虽然稍嫌证据不足，也是我们的说法的一种助力。他又曾讨论到思孟的性与天道说，他说子思有把儒家变成宗教的企图，所以他的天道说就采取了墨家肯定人格神的「天」；但中庸内的天道说，又好似一种「永恒不变的理法」，和人格神的「天」全不相干。郭先生因为在「中庸」内寻不出五行说的痕迹，所以硬拉洪范作证。其实洪范的五行说仅说明五种物质的效能，是质朴的，毫无哲学或数学的意味在内。这是子思五行说的往日，未可一概而论。我们说他的五行说虽是我们的助力

而证据不足者以此。那好像先定一个人的罪案，随后再栽赃证的样子，岂足服人？郭先生又说中庸的天道，是子思充分地挹取了道家的精华，而把天道看成「一种永恒不变的理法」，这种见解也颇可商酌。如果子思的本体论是永恒不变的理法，他还配谈什么五行！那正是一种依一定轨范而常变动的理法。一个人的思想无论怎样前后不和谐，也不能一手画圆，一手画方，所以我们认为子思的性与天道说承袭儒家而不涉及老聃。儒家的性与天道，本来一物，性就是人物上说，天道是「阴阳五行」。（朱子语类卷二十八）这虽然是朱子的率直说法，却不远于原意。以上是思孟一派的五行说。至于荀子是儒家，但他是反对子思孟子的儒家，所以他说：

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卷三天论）

万物各得其生，各得其养，这就是一种天道，但我们不必要要求知道它，那是徒劳而无功的。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以浹万物之变，与愚者若一。老身长子而与愚者若一，犹不知错，夫是之谓妄人。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也。

（荀子卷四解蔽）

并不是你不能知物之理，是说你不能遍知万物之理；既不能遍知万物之理，「与愚者若一」，又何贵乎知理？所以说「唯圣人为不求知天」。站在不求知天的立场来评论五行说，岂有不反对的道理，所以荀子要非子思孟轲了。

子思孟轲的本体论是依一定轨范而变动的理法，这种轨范即所谓「五行」，已如上述。我们曾经说思孟五行的主要意义是以「五」为纪的运行，金木水火土等不是主体，但我们并不否认思孟五行说也有金木等五材的成分。

因为金木等五材也是自古相传的五种重要事物，他们取来配合以「五」为纪的五行，是很自然的事。郑玄的中庸注解，也是这样配合的结果。配合的工作当然不始于郑玄，洪范、左传、管子、吕氏春秋、月令、淮南子中各有种种配合，事事物物包括很多。五行说所以成了人间行为的轨范，是这样配合起来的結果。子思孟轲是否作过配合的工作，虽然文献不足徵，但既大倡五行，又生在五行说的配合时代，为什么不作？有什么方法可以证明他们不作？

这些配合的五行组织，当然有种种理论，不是任意地安排，可惜先秦书中作配合工作者多而阐明理论者少，西汉经师的理论可考者大概在淮南子、春秋繁露及盐铁论等书内。盐铁论文学曰：

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阴阳，四时相继，父生之，子养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长德，秋成义，冬藏礼，此四时之序，圣人之所则也。（盐铁论下论菑）

春秋繁露内类此记述尚多，如云：

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曰：「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对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长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续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此之谓也」。王曰：「善哉，天经既得闻之矣，愿闻地之义。」对曰：「地出云为雨，起气为风。风雨者，地之所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若从天命者，故曰天风天雨也，莫曰地风地雨也。勤劳在地，名一归于天，非至有义，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五声莫贵于宫，五味莫美于甘，五色莫盛于黄，此谓孝者地之义也。」王曰：「善哉！」（卷十五行对）

这一大段理论，河间献王觉着「善哉」了，我们仍然胡胡涂涂永远不能了解！在另一篇内说：「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

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卷十一五行之义）

此外后汉书荀爽传也有如下的记述：「臣闻之于师曰，汉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为孝……故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则汉代所谓以孝治天下者，根据原来如此。由汉人的五行理论，我们才明白汉书艺文志于长天下忠臣九篇为什么放在阴阳家内。章太炎先生的考证最为得当，他说：

汉书艺文志有于长天下忠臣九篇，入阴阳家，自王应麟始发难，章学诚故竺信七略，犹绵绵为异论，不睹其书，则伊尹周公在道家，务成子在小说尚不可知，独是书耶！若微验佗书，承意递志，故确然昭晰也。古者言忠孝传诸五行，淮南王泰族训曰，「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亲而成家」。斯既然矣。（下引繁露说略）自邹衍以阴阳消息止乎君臣上下六亲之施，汉兴益著，至董生则比傅经义，以五行说忠臣。今于长书虽放失，拟仪其旨，以是为根株，故入阴阳家，无所惑也。（文录初编卷一说于长书）

汉人的学说究竟和先秦不同，他们的五行说就太偏重金木等五材的解释，而忘却形上学的根据，此所以汉儒多方士的意味而先秦诸子究竟是思想家。